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文化核心词外译的话语隔阂与融通策略研究

项 男, 王 成, 常碗君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摘要】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视角,以中国文化核心词外译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审视其外译过程中面临的话语隔阂问题,旨在突破单纯的“语言转换”范式,实现深层的“知识传播与接受”。研究发现,此类话语隔阂主要根植于三个维度:概念不对等、阐释框架冲突和意识形态过滤。为此,本文提出了四项知识融通策略:深度阐释与创造性转化、译释并举与副文本构建、语境补足与话语协同,以及区分层次与动态对应,以期为提升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 外译; 文化核心词; 话语隔阂; 融通策略; 国际传播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YJA740040);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文明互鉴’视域下百年龙江文化外译传播的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WY2025068)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481

Discursive barriers and bridging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al core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

Nan Xiang, Cheng Wang, Wanjun Ch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 tak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re terms as its research object. Employing a method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case studie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scursive barriers encountered during their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aims to transcend the mere paradigm of "linguistic transfer" and achieve a deeper level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se discursive barriers are primarily rooted in three dimensions: conceptual asymmetry, conflicting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and ideological filter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for knowledge bridging: 1)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2) a combin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with paratextual construction; 3) contextual supplementation and discursive collaboration; and 4)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dynamic corresponden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ng; Cultural core terms; Discursive barriers; Bridg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而翻译作为跨文化知识传播的核心枢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实践表明,单纯文本输出难以实现有效的话语认同,“仁”、“道”等文化核心词的外译尤易陷入“译不准”、“译不透”的困境。这些词汇是中华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结晶,其外译

本质是深层的知识体系对话与重构,而非简单的语符转换。因此,本文探讨在话语体系差异背景下,文化核心词外译如何超越“语言转换”范式,实现有效的“知识融通”。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本部分首先述评相关研究,进而系统引入知识翻译学理论,并剖析文化核心词的知识属性,以确立本文

的分析框架。

2.1 研究述评

国内外对文化核心词翻译的研究已形成多路径探索。国内研究集中于译学术语、典籍关键词及现当代话语,多采用概念史与译介学方法。国外研究则呈现哲学阐释、比较哲学及话语分析等不同取向。学界长期存在音译与意译之争,以及归化与异化之辩。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具体译例的辨析,或停留在文化适应策略层面,缺乏从知识论高度对文化核心词翻译进行系统性理论整合^[1]。同时,话语隔阂理论,包括涉及萨尔尔-沃夫假说、伽达默尔阐释学、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等,虽从多学科视角触及问题,却缺乏针对翻译情境下知识融通的专门框架^[2]。鉴于此,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视角,将翻译的本质重新界定为知识的跨语境迁移与重构,其核心要义包括三方面,正视知识的地方性与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普遍化张力;强调翻译是知识在目标语中的创造性重构^[3],而非简单转移;关注权力关系对知识翻译选择与接受的深刻影响^[4]。

2.2 文化核心词的知识属性与本文分析框架

从知识论视角看,文化核心词作为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载体,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体系性,即核心词处于相互定义的概念网络中,孤立翻译易导致意义流失;第二,具身性,其意义深植于特定的历史实践与社会生活,要求语境化阐释^[5];第三,阐释的开放性,其内涵丰富多义,要求翻译策略具备弹性与生成性。基于以上特征,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如下:以知识翻译学为核心理论,将文化核心词外译视为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与重构过程。

3 文化核心词外译的话语隔阂:表征与根源

在知识翻译学的视域下,文化核心词的外译过程绝非坦途,而是充满了由深层知识体系差异所导致的话语隔阂。这些隔阂不仅存在于语言表层,更根植于概念、阐释框架乃至意识形态层面,阻碍着中国知识的有效传播与接受。

3.1 概念层面的隔阂:“词汇空缺”与“概念不对等”

概念层面的隔阂是最直接、最显性的障碍,其根源在于源语与目标语知识共同体所依赖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分类体系存在根本差异,直接导致“词汇空缺”与“概念不对等”。^[6]

“词汇空缺”指目标语中完全缺乏对应概念的现象。例如,中国哲学中的“气”是构成万物本原的、流动的能量,这一概念在英语世界中并无现成对应物。将

其译为“air”(空气)或“energy”(能量),虽能传达部分外延,却完全丢失了其作为宇宙本体论和生命哲学核心范畴的丰富内涵,导致知识在迁移过程中被严重“降维”。

“概念不对等”则更为隐蔽和普遍,指表面上存在对应词,但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情感色彩存在显著差异。一个经典案例是“天”与“Heaven”的纠葛。在儒家思想中,“天”既是自然之天,更是义理之天、命运之天,是道德与秩序的本源。而基督文化背景下的“Heaven”,首要含义是上帝的居所、是彼岸的乐园,带有强烈的一神论和彼岸性色彩。将“天”简单对译为“Heaven”,无异于将中国哲学中内在于世界的、形而上的最高范畴,强行纳入西方宗教的“神学”阐释框架,造成根本性的意义扭曲。这种不对等并非译者的疏忽,而是源于两种文明对世界本原理解的知识论分歧。

3.2 阐释框架的隔阂:逻辑范式与认知传统的冲突

阐释框架的隔阂比概念隔阂更深一层,它涉及知识被理解、被论证和被组织的整体模式。当源语与目标语知识共同体遵循不同的逻辑与认知传统时,即使概念被“准确”翻译,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也可能在阐释中被解构或重构,导致“形似而神非”。

儒家核心概念“修身”的翻译与接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修身”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内在道德实践,达到人格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其逻辑是伦理本位和关系导向的。然而,在进入西方学术语境时,“修身”常被置于心理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被类比为“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虽然二者都关注人的潜能发展,但“自我实现”强调个体内在潜能的充分发展与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其内核是个人主义的。而“修身”则强调个体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道德义务与规范遵循,其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社会本位取向。这种阐释框架的偷换,使“修身”所承载的儒家集体主义伦理观被悄然置换为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独特的知识属性在跨语际旅行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3.3 意识形态的隔阂:权力结构与预设立场的过滤

意识形态的隔阂处于最深层,它关乎权力、地位和利益,表现为目标语语境中特定的政治立场、文化成见和学术权力结构对知识翻译的选择、表征与接受进行的无形过滤和有意识导。《论语》核心概念“君子”的译介流变,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在理雅各(James Legge)19世纪的经典译本中,“君子”多被译为“gentleman”(绅士)。这一译法将孔子理想的道德楷

模, 类比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上流社会行为规范和高贵出身为核心的“绅士”形象, 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君子”以“仁”与“德”为核心的道德内涵, 而强化了其社会阶层和礼仪风度的侧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东方社会的等级化想象。

随着时代变迁, 当代译者们试图摆脱这种意识形态偏见。亚瑟·威利 (Arthur Waley) 部分采用 “the superior man” (高尚的人), 试图突出其道德优越性; 而安乐哲 (Roger T. Ames) 与罗思文 (Henry Rosemont Jr.) 则创造性地译作 “exemplary person” (典范性的人), 旨在强调“君子”作为道德行为榜样的社会功能^[7]。这些译法的演变, 不仅反映了学术理解的深化, 更折射出意识形态氛围的变化, 即从殖民时代西方居高临下的文化审视, 到后殖民时代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以及当代学界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对话平台的努力。

4 知识融通的核心策略

面对文化核心词外译中的多层话语隔阂, 唯有采取系统性的知识融通策略, 方能实现从“翻译文字”到“移植知识”的跨越。

4.1 策略一: 深度阐释与创造性转化

知识翻译学视翻译为知识的重构, 这意味着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刻的理解者与阐释者, 而非简单的语码转换员。深度阐释与创造性转化策略要求译者在彻底把握核心词所植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 进行智慧的创造性转换, 其目标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对应词”, 而是创造一个能在目标语语境中激发类似理解与联想的“知识载体”。^[8]以中国哲学最高范畴“道”的翻译为例, 几种主流译法展现了不同的融通层次:

“Way”: 此译法利用了“道路”与“方法”的双关性, 试图传达“道”作为宇宙规律与人生途径的涵义。其优势在于形象直观, 易于初步理解。但劣势在于过于具象化, 难以承载“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内涵, 极易被简化为一种普通的方法或路径, 丢失了其作为万物本原的深邃哲学意蕴。

“Logos”: 此译借用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概念, 强调其作为宇宙理性、规律的一面。这在哲学对话层面具有一定启发性, 但“Logos”在西方思想史中与理性、言说、神学紧密关联, 将其套用于强调“道法自然”、具有超言说性的“道”, 可能导致阐释上的基督教化或过度理性化, 产生新的隔阂。

音译“Tao”/“Dao”: 这是目前学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的策略。音译法首先承认了概念的独特性与不可完全对等性, 避免了早期译法带来的意义缩减和扭

曲。它将一个全新的知识符号引入目标语, 等于在目标语词汇库中为其“注册”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户口”。其成功的关键在于, 音译必须与深度阐释相结合。当“Tao”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使用时, 译者需要通过上下文、注释或伴随文本, 逐步为其注入丰富的中国哲学内涵, 使其从一个空洞的语音符号, 成长为一个饱满的知识概念。

比较而言, “音译+阐释”的模式更符合知识融通的目标。它体现了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 承认差异是对话的起点, 并通过创造性的话语实践, 引导目标语读者逐步构建起对新知识的理解。

4.2 策略二: 译释并举与副文本构建

对于体系性强、具身性高的文化核心词, 单一的译文往往力有不逮。译释并举与副文本构建策略主张采用“核心译名(常为音译或精炼意译)+多维副文本(paratext)”的综合模式, 为知识接受搭建脚手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副文本理论指出, 标题、序跋、注释、插图等元素如同门槛, 深刻影响着读者的接受^[9]。在知识翻译中, 副文本是进行深度阐释、提供必要语境、重构知识体系的关键场域。

安乐哲(Roger T. Ames)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合译的《论语: 哲学译本》是此策略的典范。他们不仅将“仁”创造性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或“to act authoritatively”, 更通过长达数万字的学术导论, 系统阐释了儒家思想基于“角色伦理”与“礼”的社群观, 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哲学传统的根本区别。在大量脚注中, 他们详细说明了关键概念的哲学内涵、不同译者的处理方式及其理由。这种译释并举的方式, 不再是孤立地翻译词句, 而是将《论语》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行整体性移植。副文本在这里承担了“知识导游”的功能, 它预先为目标语读者设定了一个接近源语语境的阐释框架, 极大地降低了因框架错位导致的误读风险, 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知识保真与融通。

4.3 策略三: 语境补足与话语协同

单个译本的影响力终究有限。要真正融化深层的意识形态隔阂, 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语境补足与话语协同。此策略指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态的文本与话语实践, 形成关于中国核心知识的“话语流”, 逐步在目标语社会中培育起理解这些知识的“土壤”或“语境”。如系列出版物, 不仅翻译经典, 也翻译现当代学者对中国概念的哲学、历史学研究著作, 使目标语读者能接触到中国人自己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些概念。再如学术对话与评论, 鼓励和支持中外学者就核

心概念的翻译与阐释进行对话, 书评、学术会议、专题论坛等都是深化理解、纠正偏见的重要平台。

4.4 策略四: 区分层次, 动态对应

知识融通不应追求一刀切的标准化方案, 而应采取区分层次, 动态对应的灵活策略。这意味着应根据目标受众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目的, 以及文本本身的性质, 制定差异化的翻译与阐释方案, 实现从“知识引进”到“话语融入”的梯度目标。

面向学术读者时, 可采用更强调概念准确性和体系性的策略, 如音译为主、辅以详尽学术性副文本。译者的首要任务是知识的保真与深度阐释, 服务于学术研究^[10]。面向普通大众读者时, 在大众读物或普及性文本中, 则可适当采用意译、释译或类比等更易于理解的方式, 减少阅读障碍。例如, 在介绍“阴阳”概念时, 可先使用“complementary opposites”(互补的对立面)等解释性短语帮助建立初步印象, 再逐步引导。

5 结论

本研究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 系统探讨了文化核心词外译的话语隔阂与融通策略。其本质是地方性知识的跨体系旅行与创造性重构, 而非简单语符转换。研究系统揭示了概念不对等、阐释框架冲突与权力结构过滤三类话语隔阂的深层根源; 构建了包含深度阐释与创造性转化、译释并举与副文本构建、语境补足与话语协同、区分层次与动态对应四大策略的立体化融通方案。

参考文献

[1] 汤纪骅. 一个翻译学的元学科——知识翻译学研究现状

的综述. 当代外语研究[J]. 2025(03):108-118.

- [2] 蔡基刚. 知识翻译学——研究对象、学科交叉与理论建设[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05):5-6.
- [3] 罗迪江, 罗旋晓. 知识翻译学: 知识对翻译的塑造[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03):109-116.
- [4] 杜世洪. 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基质[J]. 中国翻译. 2024, 45(01): 27-36.
- [5] 孔令翠, 李春兰, 邓丽娜. 中西哲学视域下知识与知识翻译学的建构[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04):95-107.
- [6] 汪洋, 邓冬群. 知识翻译学: 知识与翻译的关系阐释[J].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 2024(14):53-56.
- [7] Marco, J. The translation of ideologically charged texts: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speeches[J]. Translation Spaces. 2021, 10(1):120-140.
- [8] Wang H. Re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J]. Perspectives. 2020, 28(5):56-72.
- [9] Kiraly D. Towards a socio-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The role 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1, 15(2):135-152.
- [10] 杨朝军, 炎萍.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J]. 外文研究. 2023, 11(03):82-8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